

焦点透视

访谈提示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三孩”政策正式入法。此次修改完善了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对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作出规定。此前,关于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政策部署也密集实施。在此背景下,深入评估婴幼儿托育与女性发展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热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就此与有关专家展开了深度对话。

女性发展与家庭视野下的婴幼儿托育建设

——对话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范语晨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三孩”政策正式入法。此次修改完善了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对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作出规定。此前,关于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政策部署也密集实施。在此背景下,深入评估婴幼儿托育与女性发展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婴幼儿托育如何影响女性劳动就业?这些影响的背后反映着怎样的社会与文化现状?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应如何更好适应女性诉求,促进家庭的整体发展?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就此与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展开了深度对话。

影响评估:婴幼儿托育有利于女性劳动参与和长远发展

记者: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婴幼儿照护”的概念。2021年,在继续放开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婴幼儿托育建设的相关政策密集实施。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此次修改对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做出了规定。您认为这体现了国家怎样的宏观导向?

任远:在人的生命历程中,婴幼儿的健康和教育对其人生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婴幼儿照护和发展的投资也是家庭福利体系的关键部分,直接关系到女性发展和家庭整体幸福。婴幼儿照护的福利制度建设不足会加重家庭的负担,也会削弱家庭生育意愿,扩大家庭和工作(尤其对于女性而言)的不平衡。因此,从国家发展和家庭建设的背景出发,婴幼儿照护应成为当前国家发展体系和福利体系的重要关注内容。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化,家庭的功能日益削弱,婴幼儿照护的家庭困境日益突出,婴幼儿照护和女性发展的冲突也更加凸显。社会发展对婴幼儿照护的需求在增长,婴幼儿照护的公共建设显得相对不足。因此进入2019年后,国家公共政策更加重视婴幼儿照护的

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最近密集出台了相关政策,并将完善生育支持的措施纳入法治轨道。可以预见,未来5-10年内,婴幼儿照护的社会服务体系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记者:发展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的积极社会效益是多方面的,其中对女性劳动就业的作用尤为明显。可否结合您近期的研究,说明一下婴幼儿机构托育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状况?我们在以往采访中发现,“母职惩罚”除显性影响外,还体现为一些难以量化的因素。这是否意味着机构托育对女性发展的积极效益是长远且不断释放的?

任远:生育和婴幼儿照护对女性就业和经济收入具有不利影响,这种现象被认为是一种“母职惩罚”。最近,我们研究团队在全国开展了一项以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为主题的社会调查,其中包含了相关内容。我的研究助手韦丰和我对此也有一些研究发现。研究数据表明,0-3岁婴幼儿的社会机构托育会显著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而社会机构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女性劳动参与而发挥作用。当前我国城镇中的婴幼儿照护,相当程度上还需依靠祖辈隔代照料。我们也发现,无论家里是否有祖辈的帮助,机构托育对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都有显著作用。

“母职惩罚”对于女性发展还有一些综合的、长期的影响。婴幼儿照护对女性的“母职惩罚”会带来生命历程的长期影响。劳动参与的减少和职业中断,对女性长远的工资水平、职位晋升和发展都会产生消极作用。因此,社会机构托育托幼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女性当下的就业,也产生着生命历程的累积效益。可以说,生育对于家庭发展而言构成了一个新的变化,而社会托育托幼能够帮助女性和家庭应对变化,实现平衡的生活和更好的发展。

问题透视:传统性别观念与城乡差异下的婴幼儿托育

记者:婴幼儿机构托育对女性就业有积极作用,对于男性就业是否有影响?不少研究表明,女性承担主要育儿责任依旧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现象。您认为普惠性托育体系的建设是否有助于扭转“带孩子是母亲的事”这一传统性别观念?

任远:我们近期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机构托育对女性就业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对于男性的就业并没有显著影响。这也折射出,在当前的社会性别分工中,婴幼儿照护主要还是由女性承担。

我认为普惠性托育托幼体系的建设并不会直接帮助扭转“带孩子是母亲的事”这一传统观念,其作用在于,在当前的性别分工格局下,托育托幼体系尤其有利于女性的发展。当然,改变传统性别观念,促进男性的家庭参与十分必要。男性的婴幼儿照护参与也有利于缓解家庭-工作的冲突,并有利于女性发展,这本身也是性别平等的重要测度指标。研究表明,男性的家务参与对提高家庭生育意愿也有积极影响。

记者:我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婴幼儿托育对女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城乡差别?您认为城乡婴幼儿托育服务应如何适应不同劳动性质的女性需要?

任远:城乡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对社会托育系统的需求并不一致。与乡村具有较大弹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相比,城市的现代化大生产使得婴幼儿家庭照护更为困难。社会机构托育托幼服务本身是城市化过程中内生的结果。而随着城市化进程渗透到乡村,乡村也需要发展社会化的托育托幼。

实际上,在城市内部也存在城乡差别。例如,托育托幼服务对城镇中农村户籍流动妇女的劳动参与会更重要。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已经可以进入公办学校,而婴幼儿和学龄前时期则不属于义务教育。现实中,不少流动女性和儿童不得不采取家庭分离的方式,由祖辈在农村中照顾婴幼儿;或是自己不得不伴随儿童返回农村,这加剧了对儿童发展和女性发展的限制。可见,流动人口家庭对托育托幼服务也有迫切需求,普惠性托育托幼制度建设,需要以居住地为基础逐步对所有居民提供服务。

路径探索:托育建设应秉持家庭发展和生育服务的整体视野

记者:您在去年的文章中曾谈到,不应将托

育托幼简单视为刺激生育率的社会政策,而应在家庭政策的视野下讨论。您认为在如今“三孩”政策的背景下,怎样的托育发展思路能更好促进家庭的整体发展?

任远:托育托幼政策的发展会有利于生育率的提高,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应仅为提高生育率来发展托育托幼服务。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托育托幼是重要的生育配套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强托育托幼社会服务体系的建设。

应强调托育托幼服务对于家庭发展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对生育的支持。生育政策应该致力于对生育提供服务和支持的政策,托育托幼是家庭政策的组成部分。良好的家庭政策要兼顾对生育的服务和支持,妇女就业和发展、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以及提高家庭福利、男女平等诸多方面,使得对生育的服务支持和对妇女发展的支持作用得到综合实现。要避免为了鼓励生育而增加妇女发展的压力,或者因为增加生育而损害妇女发展和家庭福利。生育政策需要从单纯考虑生育率的狭窄视野中转向家庭,具有家庭发展和生育服务的整体视野,实现对家庭发展和生育需求的支持,实现儿童和妇女发展的综合目标。

记者:今年8月7日,北京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结合这一新举措与您关注的其他地方政策,您认为当前托育机构的探索有何建议?

任远:北京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聚焦,这样的专业协会有利于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推动高质量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发展。近年来,我们看到婴幼儿托育托幼服务体系建设的显著进展,如政府服务标准的出台、社会协会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积极推动婴幼儿照护市场的发展,这些都是很好的进步。

当然,目前托育托幼服务仍有较大的发展完善空间。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对地方探索经验进行总结,也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社会托育建设的经验,比如在北欧国家中,除了托育机构,也有小班化的、基于家庭的托幼服务。对于婴幼儿托育托幼的发展,需要财政的投入,也需要鼓励扩大社会投入,呼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建设。

研究视窗

《制造亲密空间:公私困境下托育服务的本土化路径》

作者:郭戈

家庭常被认为是最适合婴幼儿成长的空间,因此在社会托育服务的建设阶段,能否放心地将3岁以下儿童送出家庭,交由专业照护者进行集体托育是影响有需求家庭作出托托决策的重要障碍。本文以空间理论为视角,亲密性空间为研究框架,通过分析B市一家托育机构的建设过程,探索解决当下公共托育制度与私人托育文化间冲突的机构建设路径。研究发现,建设集家庭-机构-社区于一体的亲密性托育空间能有效满足家庭对社会照护服务的个性化与情感性需求,提升家长对托育服务的信任程度。该路径需由经营者、育婴师、家长、幼儿、社区等众多行动者共同参与,推动机构从物质空间上嵌入城市与社区生活、从精神空间上复制家庭教养,从社会空间中营造关系密切的育儿支持网络。

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措施研究——基于18省市“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实施意见”的分析》

作者:郭敏 左志宏

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对于推动“三孩政策”落实、实现“幼有所育”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基于18省市“婴幼儿照护服务实施意见”发现,对于家庭照护和社会托育两种照护模式,当前各省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措施的“规范”侧重点不同,“支持”形式也有所差异。尽管现有措施有利于保障社会托育的安全与规范,刺激普惠性托育服务发展,但却存在家庭照护政策薄弱、社会托育政策不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人员建设狭义化等问题。因此,作者建议完善家庭照护的标准规范、质量监督体系,加强对家庭照护的经济支持;明确不同性质托育机构的收费要求,健全并落实本地的托育机构服务标准;加快研制婴幼儿照护服务人员专业标准,更好地推动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发展。

来源:《社会建设》2021年第3期

《回归结构性平等的初义:当前女性主义的自我革新》

作者:崔应令

当前女性主义在自由与道德、机制与两性、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及性统治等议题上存有争论和混乱,导致诸多质疑和批评。引起这种混乱的原因既有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多元性和发展性问题,也有现实中女性内部阶层、地域、族群等的差异及女性主义被利用的情况。解决当前女性主义不利局面的办法是回到女性主义运动创立之初的追求和理想:即回归两性结构性平等的初义,真正实现性别权力平等,完成女性主义内部的自我革新。具体策略包括:厘清女性主义运动的战略利益,明白性别议题的自限范围、直面女性内部的差异和多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改变以往女性总是斗争者的单一形象,更多以建设性面目出现。

来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范语晨 整理)

观点秀场

《1921》:建党百年正青春 巾帼英雄显奇功

· 阅读提示 ·

《1921》是献礼建党100周年的历史剧情电影。影片呈现了一批巾帼英雄形象,她们“把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影片不仅向展示了女性思想的觉醒和女性力量的崛起,也为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提供了新的性别叙事思路。

■ 赵崔莉

《1921》是献礼建党100周年的历史剧情电影。这部影片集中呈现了一批巾帼英雄的形象,展示了新女性反抗旧礼制、追求新思想的勇气和为革命理想奋不顾身的豪情。这些革命女性“把自己的理想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以生命赴使命,舍小我顾大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求学求知 立志之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五四时期的新女性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四处求学,接受新思想的洗礼,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信念。

1919年,向警予参加毛泽东、蔡和森的“新民学会”,同年底赴法勤工俭学,以惊人的毅力掌握法语,读完法文版《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1922年初,向警予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国内的进步女性也纷纷在求学中接受新思想。缪伯英是中共一大召开前,全国53名党员中最早入党的女党员。1919年,缪伯英在北京大学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等课程,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号召女同胞冲破封建罗网,做时代的新女性。

《1921》中被誉为“一大卫士”的王会悟在湖南女校求学时接触到新思想。她曾致信陈独秀,表达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她积极声援五四运动,参加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与李达相识相恋并结



为伉俪。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期间遭遇租界暗探,王会悟及时建议改到嘉兴去开会,并为会务安保作了周密安排。

《1921》中,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刘清扬在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在政治上已趋成熟。1920年,刘清扬等“觉悟社”社员和“曙光社”等4个团体代表在北京陶然亭共谋社会改造,李大钊做大会发言。1923年,刘清扬参加天津“女星社”,创办《妇女日报》。

妇女运动 觉醒之途

妇女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1921年,中国男尊女卑观念尚根深蒂固,一批率先觉醒的女性开始追求婚姻自由、职业自由、教育自由。《1921》中的革命女性组织参与了一系列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启迪更多女性走上觉醒之途。

缪伯英作为党内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一直战斗在妇女运动的第一线。她于1922年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于1925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书记,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她始终号召女同胞冲破封建罗网,争取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

向警予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建立健全党领导下的各级妇女运动组织。她主编《妇女周报》,组织广州、香港等地数千名工

声援省港大罢工,并成立妇女解放协会、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如蔡畅所说:“在向警予从事妇女工作之前,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毛泽东赞誉她为“模范妇女领袖”。

作为我党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李励庄1924年参与发起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当选为大同盟第一届副会长。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会长陶文,则同众多青年上街静坐。五四运动后,陶文投身教育事业,担任北京女一中中学校长。她艰苦办学,一丝不苟的精神深为各界人士赞许。百年前被誉为“四公子”的女大学生程俊英、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她们兴趣相同,生活相伴,一起探讨学术,在五四运动中为争取妇女解放与民主平等勇敢地走上街头,高举爱国旗帜……

青春无悔 抗争之歌

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崇高的革命宗旨,这些都是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百年正青春,这些新女性谱写了青春无悔的抗争之歌。

《1921》中,当毛泽东、何叔衡启程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杨开慧洋溢着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在车站送别“润之哥”。杨开慧是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为信仰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体现出对爱情的不渝和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同样英勇牺牲的还有向警予。1928年,向警予在就义前留下遗言:“人迟早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明明白

白,慷慨慨慨。”

武汉会战后,刘清扬积极主持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的工作,训练抗日妇女干部近千名,推动她们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刘清扬担任政协、妇联重要职务。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评价:“刘清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帮助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接待联络革命同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营救陈独秀出狱,甚至一起被捕坐牢,可谓患难与共,生死相依。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成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邓颖超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时期,她是觉悟社中最小的成员。1924年,邓颖超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女部部长,将天津妇女解放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宋庆龄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更多地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影响和熏陶。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她矢志不移、坚定地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妇女儿童事业而奋斗终生。

建党百年正青春,巾帼英雄不缺席。电影《1921》让更多鲜为人知的巾帼建党史迹呈现出来,不仅向世人展示了女性思想的觉醒和女性力量的崛起,也对深化党史教育与主旋律文艺创作不乏启示。其,以个体视角切入时代脉搏。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多以国家性、民族性的宏观叙事为主;如今,“新主流”电影则更多将大历史中的个体价值凸显出来,让观众有更深的情感代入与共鸣。其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主流价值观。《1921》成功地叙述了在灾难深重之际,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慷慨激昂地投入建党伟业中,回答了“历史为什么选择共产党”这一议题。其三,关注“现实感”,揭示历史对现实的启迪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讲话中指出:“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1921》通过细致的叙事呈现历史中积淀的精神与智慧,激励新时代的女性青年要以百年前的巾帼女性为榜样,“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这彰显了新时代的文艺创作应有的立场和道路,也为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提供了新的性别叙事思路。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注:本文系北京市教委高校思政教师择优资助计划“全面开放新格局下习近平文化自信与高校思政教育”阶段性成果。